

1997後的香港： 國際性大都會的臆想

李歐梵

當香港脫離殖民主義之後，是否仍然回歸「民族國家」又重演一次歷史？我認為不盡然，而應該超越二十世紀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兩種模式，走向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化的道路。我認為這個國際化的視野是建築在一連串的大都市之上，這些大都市雖然各屬不同國家，但卻是和國家互相對等的，甚至凌駕於國家之上。

「紀念香港1997回歸中國」的活動很多，我認為最有特別意義的是去年香港建築師學會主辦的國際概念設計比賽，以設計一座位於香港的紀念物來銘誌回歸中國的歷史意義。在徵求條件中特別註明：「該設計建議須適當勾劃出這個劃時代的紀元並展現這時期的社會、政治及文化狀況。」比賽有兩個目標：一是「探索一種能觸及普羅大眾領域的建築語言的可行性」；二是「喚起國際社會間對香港在1997年的意識」。

這真是一件饒有意義也發人深思的舉動。建築設計是可以直接「干預」公共空間也可以直接改變城市風貌的東西，它在理念上較社會學或哲學性的思維更具體，也較文學上的想像更實際。它可以提供一般常人想像不到的視野，也可實際表達回歸的理念。1997的里程碑應該是甚麼？這既是一個建築設計比賽的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反思的問題。從香港的歷史建築而言，最明顯的里程碑就是九龍前火車站的鐘樓，現仍立在文化中心旁邊的小公園中。它紀念的是從日軍佔領收復的香港，剛好為二十世紀作一個劃分——戰前和戰後。戰前的香港是純英國式的殖民地，戰後的香港在政治上仍屬英國殖民地，但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早已超越了殖民地的地位，特別是在70年代開始大興土木，建築高樓住宅區、海底隧道及地鐵以後，香港已變成了國際化的大都市。就人口而言，60年代後一波波從大陸來的移民也使得這個國際都市更加「華化」，但仍不失「華洋雜處」的傳統。這個傳統是30年代在上海建立的，但50年代上海解放以後卻

淪落不堪，被香港所取代。所以，也只有香港人才能真正了解30年代的上海，文革前後成長的大陸青年，早已不知「海派」是何物，更遑論國際性的大都會。

這些都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卻很少發人深省。如果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香港「殖民地」的身分早已有名無實的話，它恰好反映出殖民主義的政治也早已過時，英國派來的港督也不得不為港人着想，謀港人的民主。可惜英國的統治者謀慮不周，遲了20年，如早在70年代就勵行民主政治的話……。當然這些亡羊未能補牢的想法，不必多談。然而，殖民主義話語的孿生物就是民族主義；如果殖民主義早已過時的話，民族主義又歸何屬？其實民族國家這個模式，也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與殖民主義是一物的兩面，先有了殖民主義的侵略，才有民族國家的獨立。

然而，當香港脫離殖民主義之後，是否仍然回歸「民族國家」又重演一次歷史？我認為不盡然，而應該超越這兩種二十世紀的模式，走向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化的道路。甚麼是國際化？這不僅是後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上的說法（譬如跨國公司和國際市場），而更應該有文化的涵義和視野。我認為這個國際化的視野是建築在一連串的大都市之上，各都市之間將會有更複雜也更深厚的經濟和文化關係，這些大都市雖然各屬不同國家，但卻是和國家互相對等的，甚至凌駕於國家之上。這些國際化的都市有些共同之處：語言和文化都是多元的，居民流動性極大（旅行、遷居、移民），也自然形成多種認同；至於商品流通、多產、多消費、多媒體等等生活方式，自不待言。這些發展，都不是傳統的民族國家模式可以涵蓋的。

再回到香港九七紀念碑的比賽。頗出乎一般人的意料，這次得獎的設計徹底打破了傳統紀念的模式，既不建碑，也不立像，而是用一種「非既有型式」和「非固定基地」的空間策略，假定在每天有250萬人進出的各地鐵站，用投影機在排列的廣告牌之間，投射世界各國有關香港新聞的電視報導和形象，而這些形象也將使香港地鐵站有了視覺和空間的轉變，而成為活生生的新式流動的「紀念碑」。它處處也時時以形象表現香港的國際性，當然也可以作為香港九七後政治、言論自由的指標。得獎的是哈佛大學建築學院的三個華裔學生：劉宇揚、高浩、鄭雅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李亮聰。鄭、李二人皆是來自香港的留學生。我最近有幸和三位哈佛同學見面，禁不住問他們此項設計可否付諸實現？所得的答覆是目前仍屬「空想」，但一切設計圖表皆已俱備，只欠「東風」！我又問他們如果選一個地鐵站先作實驗的話，應屬何站，他們都不約而同的答道：「金鐘」。因為此站正是香港線和九龍線交叉之處，無論從歷史、地理和普羅大眾的生活領域而言，皆有極大的意義。即使這個理想達不到，至少也使我每次坐地鐵的時候，都會在各個廣告牌的空間「幻想」出我心目中的國際性的香港。

李歐梵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